

《达洛维夫人》：移动中的个体和共同体

杨家禹

内容提要 在与闲逛者传统及威廉斯关于城市中个体与共同体之关系的论述进行对话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探讨《达洛维夫人》中的移动性问题。本文认为，在塑造在城市中行走的个体自我的同时，小说也描写了这些个体从封闭的房间走向开阔的街道、从哀悼死亡走向庆祝生命的过程，并借助动态的街景所带来的氛围与情感，重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中的个体及其与共同体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 《达洛维夫人》 现代性 移动性 个体 共同体

《达洛维夫人》(后文简称《达》)以日常生活中的一次移动作为小说开篇——“达洛维夫人说她要去自己去买花”^①；事实上，该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似乎都分别在某个时刻出现在街道上，似乎在参加一场露天宴会，而小说最吸引人的部分或许就是这些人物在伦敦街道上的漫游：小说极为准确地描绘了伦敦这个城市，与现实地理别无二致。关于小说中的伦敦漫游，研究者或通过将人物的移动路线投射到地图上以分析他们与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②，或指出小说关于移动和地点的具体且准确的叙述对小说主题有着重要意义，是小说的一种隐性结构^③，

① Virginia Woolf, *Mrs. Dalloway*, Middlesex: Penguin Books, 1964, p. 5.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Dalloway*”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莫里斯·贝加为《达》绘制了第一幅反映小说人物主要活动区域的地图(see Morris Beja, “The London of *Mrs. Dalloway*”, in *Virginia Woolf Miscellany*, 7 [1977], p. 4); 利斯贝斯·拉尔松将小说中不同人物的多次行走路线同时投射在谷歌地图上，以清楚展示人物的行走与周围地理环境的关系(see Lisbeth Larsson, *Walking Virginia Woolf's London: An Investigation in Literary Geography*, trans. David Jone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7, p. 113)。

③ 关于《达》中的伦敦书写，多罗西·布鲁斯特早在1960年就分析了小说人物如何在街道上行走以及他们有着怎样的感受(see Dorothy Brewster, *Virginia Woolf's Lond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 48-55)，米罗斯拉夫·贝克尔也认为小说中的伦敦不仅具有情节作用，更具有结构意义，参与建构人物和激发行动(see Miroslav Beker, “London as a Principle of Structure in *Mrs. Dalloway*”, i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18.3 [1972], p. 376)。

揭示了与城市地理相关的权力结构^①。同时,研究者也注意到小说中各种形式的移动性,包括汽车、飞机和地铁的移动性等,或分析小说人物的移动与感知结构之间的关系,或阐释这些移动性与伍尔夫的诗学之间的联系。^②当然,也有学者将小说中的克拉丽莎视为女性闲逛者,认为不同于男性闲逛者将女性塑造为被观看的景观这一男性视角,伍尔夫的创作不仅表现了女性的行走经验,也将街头行走作为一种写作方式,探索女性表达的可能性。^③

虽然以上这些研究详细讨论了伦敦的空间政治和小说中的空间与叙事之间的关系,以及移动性与感官体验的关系,也涉及了女性的行走如何也是一种女性写作这一视角,却没有具体分析城市中的人物的移动经验,或者他们对地方的感受和反思与主体性之间的互动。事实上,该小说中的移动性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揭示了城市空间或移动行为的符号意义,更在于它与移动经验本身密切相关。小说中的人物不仅通过移动抵达各个地点,还在移动当中感受与城市节奏的共鸣,在移动中建构自我以及自我与外界的联系。本文以伍尔夫作品中的现代性为起点,讨论《达》中的移动经验如何塑造了街道上的个人和人群。小说对现代性和城市的再现既源自伍尔夫对伦敦多样面向的理解,也源自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恢复的对日常生活和移动性的乐观心态。小说继承了一个同移动与自由和个人主义之关系相关的传统,以此为基础在移动中塑造个体的自我,并借助对街景中的氛围和情感的描写探索个体之间形成共同体的可能性。换言之,通过书写城市中的移动经验,伍尔夫实则思考如何在充满创伤的战后英国社会中重构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

一、现代性、个人与人群

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现代性并没有一个单一的定义。从历史的角度看,

^① 例如,研究者将克拉丽莎从威斯敏斯特到邦德街的步行路线与传统的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其女伊丽莎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从威斯敏斯特到河岸街的线路与新兴的商业力量相关(see Susan Merrill Squier, *Virginia Woolf and London: The Sexual Politics of the Cit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p. 102)。

^② See David Welsh, *Underground Writing: The London Tube from George Gissing to Virginia Woolf*,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80-182; Enda Duffy, *The Speed Handbook: Velocity, Pleasure, Modern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41-146; Gillian Beer, "The Island and the Aeroplane: The Case of Virginia Woolf", in Homi K. Bhabha, ed.,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274-276.

^③ See Rachel Bowlby, "Walking, Women and Writing: Virginia Woolf as Flâneuse", in Isobel Armstrong, ed., *New Feminist Discourses: Critical Essays on Theories and Texts*,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33-35, pp. 45-46.

它指“在西欧和北美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变革，它们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工业和民主革命中达到顶峰”^①。这些变革深刻地影响了人的生活，因此现代性可以被进一步理解为“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种可能和危险的经验”^②；就此而言，与现代性联系最密切的或许就是都市场景以及与都市相关的生活经验^③。根据波德莱尔的开创性描述，“[都市]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④。马歇尔·伯曼在自己关于现代性的研究中总结道，波德莱尔的论断深刻地影响了十九世纪直至当下对现代性的理解。对波德莱尔来说，因为都市现实既充满着各种梦幻，又不乏腐败和破碎，所以现代性既有田园诗的一面，也有反田园诗的一面；这一矛盾在城市街道上显现出来，也进入了现代心灵。同样的，在受到巴黎都市灿烂、时尚的一面吸引的同时，本雅明也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看到了都市的堕落和空虚。^⑤在齐奥尔格·西美尔的研究中，波德莱尔和本雅明笔下的都市居民心理状态得到了更细致的观察：都市以接连不断的瞬间印象持续刺激身处其中的人们，在带给他们独立和自由的同时也造成消极的自我隐退，使得他们为保全自身而逐渐变得冷漠麻木，让他们以冷漠和克制来保持个性，并因此在拥挤的人群中也感到孤独失落。^⑥

在伍尔夫的写作中，都市与现代性是重要的主题^⑦；而就现代性对生活的塑造作用而言，作家的态度却始终复杂多变。这最集中地体现在伍尔夫笔下的伦敦上，她的创作中始终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伦敦，一个充满性别和阶级等层面的压迫，是工业发展造成的废墟，令人反感；另一个则充满魅力，让人沉醉其中。这种张力在作家的第一部小说《远航》中就已经表现出来^⑧，并贯穿于她之后的所有创作。当她厌倦伦敦时，这个帝国的中心便显得肮脏可鄙，所以《远航》中的伦敦“这座伟大的城市显得蜷缩而懦弱，就像一个待在原地的守财奴”，行走

① Peter Wagner, *Modernity: Understanding the Present*, Cambridge: Polity, 2012, p. 3.

② 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页。

③ See Michael H. Whitworth, “Modernity and the City”, in Michael H. Whitworth, ed., *Modernism*, Malden: Blackwell, 2007, p. 181.

④ 夏尔·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郭宏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9页。

⑤ 详见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第167-198页。

⑥ 详见齐奥尔格·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吴贻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第186-195页。

⑦ 伍尔夫在她的创作中几乎没有使用过“现代性”这个术语，虽然她在几篇随笔中提及该词，但也只是指一种时尚或新潮（see Virginia Woolf, *Collected Essays*, vol. 2,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7, p. 60, p. 133）。所以说现代性是伍尔夫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因为她在写作中所再现的诸多现象可以被归于我们现在称之为现代性的概念之中。这就类似于伍尔夫现在被公认为现代主义作家，但她本人却从未认为自己的作品是现代主义的。

⑧ See Lisbeth Larsson, *Walking Virginia Woolf's London: An Investigation in Literary Geography*, pp. 24-25.

在泰晤士河畔维多利亚堤岸的安布罗斯夫妇只发现“伦敦如何不值得爱”，感觉街道上的人和物都充满恶意和威胁：街道上穿行的汽车“与其说是陆地上的事物，不如说是月球上的蜘蛛”，周围的人群让他们既不屑又恐惧。^① 在《伦敦风景》中，伍尔夫对伦敦的批评变得更有深度：虽然繁忙的伦敦码头象征着大英帝国的辉煌和权力，但作家看到的却是码头上“堆满了破桶、剃须刀片、鱼尾、报纸和灰尘的驳船，正把货物卸在世界上最荒芜废弃的陆地上”，并进而认识到，“正是我们——我们的品味、我们的风尚、我们的需求——使起重机不停下降旋转，使船只在海上航行。我们的身体是它们的主人”。^② 换言之，在发现日常生活和全球性商业运作之间的关联的同时，伍尔夫也意识到人们在现代生活中对物质的贪婪导致生态被破坏，造就了城市中的废墟景观。

然而，当伍尔夫醉心于伦敦的都市生活时，她笔下的这座城市又展现出光彩夺目的一面，意味着无限的惊喜和刺激。在《海浪》中，当奈维尔乘火车去往伦敦时，他只感到兴奋和紧张：“在那些邮车、搬运工和等待出租车的拥挤人群中，有怎样了不起的冒险在等着我呀？我感到渺小、迷失，但又激动无比。”^③ 伍尔夫对伦敦最热烈的赞美来自《达》：小说中，伦敦街头的各种热闹景象让人们“全都热爱”；汽车、飞机和公共交通不仅构成都市韵律的一部分，也塑造着现代心灵；城市中的各种声音，哪怕是噪声——“铜管乐队、手摇风琴乐手……头顶上飞机发出奇怪的尖啸声”——也只会让人们感受到生活的活力并乐于融入由现代技术所组成的都市节奏（see *Dalloway*: 6-9）。在作家这类赞美伦敦的小说中，尽管书中人物的都市生活充斥着机器和技术，但他们却并未受其控制，也未感到都市的速度与刺激对自我的威胁。

如果说波德莱尔将城市中的闲逛者^④作为现代性的典型形象，那么在《达》这部伍尔夫最集中表现城市的作品中，行走的人或者说更广泛意义上的移动的人，也同样是现代都市场景中的一个原型。《达》创作于《雅各的房间》之后，后者突出表现的是一战后的哀悼、静止与沉寂：“绝对静止的空间……大地仿佛

① See Virginia Woolf, *The Voyage Out*, London: Hogarth Press, 1949, pp. 4-12.

② See Virginia Woolf, *The London Scene: Six Essays on London Lif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75, pp. 8-9, p. 15.

③ Virginia Woolf, *The Wave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60, p. 52.

④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的伦敦浪荡子（dandy）也是一个典型的街头形象。不过，相比于闲逛者对周围环境的关注，浪荡子更多地陶醉于“展示自己，以供[别人]观看”（see Deborah L. Parsons, *Streetwalking the Metropolis: Women, the City, and Moder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0）。此外，浪荡子传统所关注的更多是时尚与男性气质，而非移动的个体与城市空间之间的互动（see Christopher Breward, “Masculine Pleasures: Metropolitan Identities and the Commercial Sites of Dandyism, 1790-1840”, in *The London Journal*, 28.1 [2003], pp. 60-72）。

死了一般。”^① 小说结尾处雅各房间里的一双鞋既暗示小说的叙事最终停滞在对过去的记忆中，也表明移动的可能不复存在，因为曾经穿着这双鞋四处移动的人已经永远留在了战场上。然而，《达》从小说一开始就表现出移动的能量，小说的基调也从哀悼变成欢乐的庆祝，与小说描写的大战后的重生相呼应：尽管城市中仍然存在战争留下的创伤，但它也是新生的场所，孕育着新生活的希望。^②

《达》对移动性的积极描写让小说中的街头行走和波德莱尔等人笔下的闲逛有了重要不同。波德莱尔的闲逛者混迹于人群当中，但又保持着绝对的独立；他在城市风景中移动，时刻接收着街道上充满诗意但又转瞬即逝的感官刺激。在这一传统中，个人和人群之间的鸿沟难以逾越。例如，在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人群中的人》（1840）中，闲逛者与人群保持着心理距离，他通过观察人群中的个体会感到一种征服感，但人群中的个体又始终保持着他无法企及的神秘，且人群也是隐秘罪恶的藏身之处。^③ 在波德莱尔的《人群》（1869）中，虽然闲逛者不再是外在于人群的观察者，而是人群的一部分，能够享受身处人群之中的乐趣，且“在他愿意的时候，他能够进入每一个人的角色，就像那些游荡的灵魂寻找一个身体”；然而，闲逛者与人群的这种联系并不是因为他与后者在精神上契合，而是因为“对于他而言，一切都是空洞的”。^④ 换言之，对于波德莱尔笔下的闲逛者而言，独自一人和身处人群之中是完全相同的状态。本雅明继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群或大众的看法，认为他们彼此陌生，被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需要被锻造成形。本雅明在坡对城市大众的描述中读到了他们的野蛮，在波德莱尔那里读到了他们如何因为受到连续的刺激而感到震惊和危险。不过，本雅明对闲逛者仍带有诗意的想象，认为“人群中的人绝非游荡者〔闲逛者〕。在人群中的人身上，沉静让位于狂暴行为”，并试图将闲逛者从人群中拯救出来。所以，本雅明的闲逛者处在人群之外，也超乎日常生活之上，他沉浸在自己的漫游中。^⑤ 换言之，在陶醉于街道景观的同时，波德莱尔等人的闲逛者厌倦乃至厌恶城市。所以，他们

① Virginia Woolf, *Jacob's Room*, ed. Kate Fli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34.

② See Robert Alter, *Imagined Cities: Urban Experience and the Language of the Novel*,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04.

③ 详见爱伦·坡《人群中的人》，陈永国译，收入刘象愚编选《爱伦·坡精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51-160页。

④ See Charles Baudelaire, *The Parisian Prowler: Le spleen de Paris, petits poèmes en prose*, trans. Edward K. Kaplan,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9, p. 21.

⑤ 详见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修订译本），张旭东、魏文生译，张旭东校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52-163页。

的闲逛者在徜徉于接连不断的印象中时，又拒绝与周遭的人群及环境认同。

《达》对城市及其中的人的描写与英国的城市书写传统也有所不同。雷蒙·威廉斯指出，英国文学中独自在街道上漫游的人与对现代城市的感知紧密联系在一起，从浪漫主义时期至现实主义时期，这一形象频频出现在包括布莱克、华兹华斯、盖斯凯尔夫人、狄更斯在内的诗人与作家笔下，之后的伍尔夫也是这个谱系中的一部分；这些诗人与作家笔下的人物在走入城市后有两种可能的走向，一是跨越人群的陌生感，认识到他人与自己有着相同的同情心和道德感，二是感到孤独乃至恐惧。^① 不过，威廉斯在具体的分析中似乎只关注后一种走向，更多看到城市带来的断裂、异化与意义的丧失，并认为孤立的主体无法形成共同体，没有意识到伍尔夫在作品中探索了联系如何在城市中成为可能。^② 此外，威廉斯的分析侧重于笼统意义上对城市的感知，没有探索具体的移动经验，而移动经验正是伍尔夫小说的重要元素。事实上，《达》中的人物在街道上移动的同时，清楚地意识到了周围大众的存在，也真诚地渴望与周围人群的认同和融合。

二、“我喜欢在伦敦漫步”：移动、自由与自我意识

“简直是个奇迹。眼下 [理查德] 正穿过伦敦，他要反复对克拉丽莎说，我爱你。”(Dalloway: 128) 这是理查德的一段内心独白，他想到许多人在战争中死去，自己却活了下来。这样的想法之后又出现了一次：“他的生活是个奇迹……他正在走向威斯敏斯特的家。”(Dalloway: 130) “奇迹”来自他还活着这个事实，也来自此时此刻的他正安然无恙地在伦敦的街道上自由行走这个事实。理查德对移动的感受或许也是伍尔夫对待移动和自由的态度。诚然，对于身处和平时期的人而言，移动是理所当然的寻常行为，但对于经历过战争的人而言，街道是战争侵入日常生活的场所，在街道上行走的人可能遭到空袭，公共交通工具或被征用，或被人们用以躲避战争袭击。^③ 在《雅各的房间》中，“酒店房间

① 详见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子满、刘戈、徐珊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17-319页。

② 详见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第332页。

③ 一战爆发后，许多伦敦的公交车辆和司机被征用，被运送到国外的战争前线，这导致国内公交运送能力不足。此外，伦敦的公交系统也是敌军空袭的轰炸对象，导致乘客伤亡。不过，公交系统也为人们提供了空袭时的避难所，人们在接到空袭警报时会到地铁站台内躲避 (see Transport for London, “Research Guide No 22: London Buses in World War I”, <https://content.tfl.gov.uk/research-guide-london-buses-in-world-war-1.pdf> [2025-12-22]; Transport for London, “Research Guide No 23: ‘The Companies’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War I Effort”, <https://content.tfl.gov.uk/research-guide-23-london-transport-during-world-war-i.pdf> [2025-12-22])。

里几乎夜夜都有子弹射穿脑袋的事……即便身体幸免于伤残，心灵在走向坟墓时也都伤痕累累”^①。正是这样的经历让街道上的安全和自由的移动成了“奇迹”。或许，这便是伍尔夫在《达》中将移动作为中心主题的原因：她在战后百废待兴这个语境中思考移动对个体的意义，它不仅标示着战争与和平的张力，也是日常的普世经验。

《达》中的移动充满动感和能量，它不仅带来无限的乐趣，还与个体意识密切互动，让个体能够充分地感受到自由。这样的个体有异于波德莱尔和威廉斯观察到的城市闲逛者的典型形象：在《达》中，与移动相关的自由感在许多人物那里都得到了热烈的表达，移动与自我的本质被联系在了一起，成为这些人物探索、质疑和建构自我主体性的方式。伍尔夫相信，真正的自我并不限于一时一地，而是变化多端，处在不断的漫游之中，“只有我们任其自行其是，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②就此而言，伍尔夫在小说中对移动的表现，既继承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一个相关的思想和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现代的框架下重新阐释移动、自我和自由等概念，并在这些概念与现代性之间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有研究者指出，在封建时代的欧洲，由于交通不便且土地归私人所有，移动的权利受土地所限，移动性极为稀缺。随着欧洲商业资本主义在十六世纪开始发展，移动性得到极大的扩展，社会对土地的依赖和空间上的停滞被打破，自由、移动性和城市生活之间的关联也得以诞生。与此同时，移动、自由与自我的关联也在思想文化层面得到了构建。近代物理学和医学的发展影响了霍布斯对自由和移动的理解，他将运动与人的想象与激情联系在一起，认为“自由意味着没有抵制，抵制指的是对运动的外在阻碍”。^③换言之，在霍布斯看来，拥有身体移动的可能性就等同于拥有自由，移动是自由的具体体现。就自由而言，它指向的是现代主体意识。查尔斯·泰勒认为，人类的主体是一种现代认同，它是“内在感、自由、个性和被嵌入本性的存在”。尽管奥古斯丁早已从基督教神学这个角度引入内在自我，但直至文艺复兴之后内在自我才更为世俗化，人们向内心探询的目的不再只局限于发现上帝，也在于发现生活的秩序或意义。在蒙田那里，对于自我的探寻和反思又达到了一个新境界，他寻求个体的独特

^① Virginia Woolf, *Jacob's Room*, p. 106.

^② See Virginia Woolf, *Collected Essays*, vol. 4,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7, p. 161.

^③ See Tim Cresswell, *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10–15; see also Thomas Hobbes, *Leviathan*, ed. J. C. A. Gaski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0–33, p. 139.

性，并且不对自我进行理性的批判，而是通过转向内心来理解自己的需要。至浪漫主义时期前后，一个现代自我逐渐形成，它的形成不依赖于外在的宏大秩序，而是来源于内在的自我意识。^①

浪漫主义哲学家和思想家探索着自我的深度和创造性，还在移动（尤其是行走）、沉思、自由和自我之间建立起联系。在《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中，让-雅克·卢梭将行走与思考联系在一起，指出在散步时自己的头脑能够“完全自由地思考”^②。换言之，散步不仅能让他敏锐地观察周遭事物，还能帮助他沉入自我的内心，追寻记忆和梦幻，此时散步的目的在于其自身，而不是为了到达某个地方，于是散步中的观看“成了一种对自我的确认，而非理解外在世界的方式”。^③ 在华兹华斯那里，情况也是如此：在行走和与自然对话的过程中，诗人发现了自我，例如在《我独自游荡，像一朵流云》（1807）中，诗人漫步时所见到的水仙花给他的心灵带来极大的快乐，使他在孤寂时能够重新感到一种自我的完整和满足。^④ 这些浪漫主义者关于行走体验的描述持续影响着维多利亚时代及之后时期的人们，其中包括伍尔夫的父亲，即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历史学家兼作家莱斯利·斯蒂芬。他在散文《赞美行走》（1901）中称行走是简单但自足且富有乐趣的活动，对诗人和哲学家都有教益，只有当一个人拥有沉思的能力时，才能充分地享受这种乐趣。^⑤

伍尔夫不仅继承了浪漫主义者所确立的移动、沉思、自由与自我之间的关联，还对其作出了改写，即将他们在自然风景中的经验移植到城市风景中。在随笔《街头漫游：一次伦敦历险》中，伍尔夫热情地描绘了在街道上移动的快乐：“逃离是最大的乐趣；在冬日的街头漫游是最大的冒险。”她尤其提到了自我在漫游过程中的产生和发展：“我们的灵魂所分泌出将我们包裹起来的外壳……破裂了，只剩下当中一个知觉的牡蛎，一只巨大的眼睛。”^⑥ 也就是说，当人们在街道上漫游感知外在世界时，他们的自我被除去了外在的束缚，由此可以去探索和发展自我。这个多变的自我在《夜幕下的苏塞克斯：汽车里的反思》中得到了更具

① 详见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韩震等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182-277页。

② 让-雅克·卢梭《卢梭全集第3卷：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及其他》，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33页。

③ See John O. Lyons, *The Invention of the Self: The Hinge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12.

④ See William Wordsworth, *William Wordsworth*, ed. Stephen Gill,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65-266.

⑤ Qtd. in Morris Marples, *Shanks's Pony: A Study of Walking*, London: J. M. Dent & Sons, 1959, pp. 146-147.

⑥ See Virginia Woolf, *Collected Essays*, vol. 4, pp. 156-166.

体的表现：汽车的速度所带来的新的移动体验让伍尔夫感到“自我发生分裂”，四个自我被唤醒，有着各自的感受力，并在彼此之间进行对话。^①

同样的，她笔下的人物在城市街道上体会到了浪漫主义者在自然中体验到的超验感，这也是伍尔夫与许多其他现代主义者及波德莱尔等人的差异所在。如前所述，伍尔夫绝非对城市的冷漠与阴暗一无所知，但她始终对城市积极的一面保持开放，她笔下的许多人物在现代社会中并不感到异化和孤独，他们对城市中的街道、建筑与雕塑，甚至街上的其他陌生人都感到亲近，就如华兹华斯笔下湖边风景中的主人公，他们在移动中体会到的不是自我的丧失，而是自我的确认。换言之，伍尔夫在移动中塑造人物的自我意识，让他们探索移动、自由和自我的关系，移动便成了人物自我形成与变化的条件与方式。在《达》中，克拉丽莎及小说其他人物的移动都是与自我觉察有关的瞬间。^② 小说中心人物克拉丽莎在帝国秩序中处于核心位置，作为政治家的妻子，她生活在伦敦的政治中心威斯敏斯特，以一个女主人的角色连接起伦敦的精英阶层；然而，这个具有公共性的身份更多是在家庭这一私人空间表现出来的，反而是在街道的公共空间中，她的自我得到发展。^③ 克拉丽莎在移动中沉思，在街道上的行走让她感到“纵身一跃”般的喜悦和自由感，喧嚣的城市没有让她感到疏离和空虚，“克拉丽莎确信，即使身处车水马龙之中……也能感受到一种特殊的寂静或庄严肃穆，一种难以名状的停滞”。正如街道上行驶的出租车让她“有一种持久的感觉，想要离开，独自去海边”，外在的刺激成为她重新发现与反思自我的线索，让她的整个散步过程都伴随着对自我的思考。她在两个自我之间挣扎：一个是“达洛维夫人；甚至不再是克拉丽莎；只是理查德·达洛维夫人”，另一个则不受这类标签的限制。如果说客厅和宴会为克拉丽莎作为达洛维夫人这个身份的象征，那么街道和街道上的移动性则使她对自我产生疑问：“她不会如此评价自己，说自己是这样的，自己是那样的。”（see *Dalloway*: 5, 11, 13, 11）

就这样，伍尔夫表明现代性中的移动性能让身份和主体性处于变动之中^④，使看似不可动摇的秩序产生松动，并为重新思考自我创造机会。街道上的移动性不仅让克拉丽莎对自我产生疑问，也为她的自我提供了某种解答：在街道上

① See Virginia Woolf, *Collected Essays*, vol. 2, p. 290.

② See Liesl M. Olson, “Virginia Woolf’s ‘Cotton Wool of Daily Life’”, in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26.2 (2003), p. 49.

③ 关于伍尔夫写作中的私人与公共这两个概念，相关讨论可参见 Anna Snaith, *Virginia Woolf: Private and Public Negotia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p. 1–14.

④ See Andrew Thacker, “Traffic, Gender, Modernism”, in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4.1 (2006), p. 180.

行走所感知到的外在世界给了她一个重新定义自我的机会，街道上的行人、交通、铜管乐队让她清楚地感受到自己所热爱的“生活、伦敦、此时此刻的六月”（*Dalloway*: 5），而对外在物质世界的观察也总会落到她对自我的确认之上：

在这个季节，邦德街的清晨使她着迷；街道上旗帜飞扬，商铺林立，毫无俗艳的炫耀；商店里的一卷粗花呢布，她父亲曾在这个商店购买衣服达五十年之久；一些珍珠；冰块上的三文鱼。

“这就是一切”，她看着鱼铺子说。“这就是一切”，她重复道，此时在一家手套商店的橱窗停留了片刻，在大战前，你能在这儿买到近乎完美的手套。（*Dalloway*: 13）

“这就是一切”的含义或许是这就是生活的真相、本来面目，就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这句话出现在克拉丽莎对自我和生活进行的一系列反思之后，这些反思在她踏出家门那一刻就开始，她先是回忆自己年轻时的时光，然后开始思考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这就是一切”是对她在移动中所产生的一系列有关自我的疑惑的回答。

对于小说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塞普蒂莫斯来说，在公共空间当中的移动也为他带来了自由和对自我的感知。塞普蒂莫斯从一战战场回到伦敦，“有着诗人的敏感”的他备受炮弹休克症的折磨^①，即便回归到了和平的生活当中，经历了战争与死亡的他仍然感到恐惧、麻木和压抑。但是，在室外的空间移动帮助他恢复了对世界的感受力：身处城市中的公园这一空间，“鸟鸣与车声相互交织，在奇异的和谐中奏出音乐……塞普蒂莫斯感到自己被引向生活”，他发现“树叶有生命，树木也有生命……他的身体由数百万条纤维与树叶连接起来，并随着树叶的扇动上下摇摆；当树枝向前伸展，他的身体也随之伸展”，让他因战争的创伤而紧绷的神经也变得舒缓。他还感受到公园对他生命的接受：“世界仿佛在说：我们欢迎；我们接受；我们创造……无论他看向哪里，看向房屋、栏杆、跨越栅栏的羚羊，美都立即出现……所有这些都平静而合乎情理，都由日常的事物构成。这一切就是现在的真理，美就是现在的真理。”（see *Dalloway*: 77, 26, 77-78）正如克拉丽莎的“这就是一切”，“这一切就是现在的真理”不仅包含对外在现实

^① See David Dowling, *Mrs. Dalloway: Mapping Streams of Consciousness*, Boston: Twayne, 1991, p. 93.

的肯定，还包含对自我的确认，因战争阴影的折磨而渴望安宁的塞普蒂莫斯终于在城市空间的移动性中感受到了平静，找寻到了心灵的慰藉。

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彼得也在漫游的过程中获得了自由的感觉，并在移动中思考，最终完成了对自我的确认。彼得是一个颇具矛盾性的形象。一方面，在小说所集中描写的中上层阶级人物中，他更像是一个“他者”^①，即便已经五十多岁，他仍感到自己“像是年轻的男孩或女孩，情绪总起起伏伏”，并嘲笑克拉丽莎是位“完美的女主人”，不能理解她为何嫁给了一个缺乏想象力的政客（see *Dalloway*: 79, 69）。但另一方面，他似乎又认同帝国和男性的权力：他选择的行走路线途径特拉法加广场和皮卡迪利，与帝国的叙事联系在一起，而他在途中跟随陌生女性并想象自己与之有了一场艳遇这个情节则彰显着他的男性视角。^②一个矛盾的自我就这样存在着、骚动着，而街道上的移动则是他确认自己对生活的热情的契机：在离开克拉丽莎的家走上维多利亚街后，彼得在移动中思考自己与克拉丽莎的关系和自己一生中的经历，一度感觉孤寂低落，但行走却逐渐让他意识到自己“逃脱了！完全自由了——就像摆脱了习惯的束缚，心灵像一团肆意的火焰，四处扭动，仿佛马上就要冲出牢笼。我好多年没感觉到这么年轻了！彼得想，从他过去的样子当中逃离出来”；于是，在街头不受束缚地移动让彼得感到自由，充满活力，让他领悟到更多生命的可能性，帮助他化解了对自我的质疑：“所以，他想，我将永不回到灯光之下；不再回到客厅；不再读完我的书；永不抖落烟斗中的灰烬；永不按铃铛叫特纳太太来打扫房间；相反……让我和其他一切一同归入空无。”（see *Dalloway*: 59, 65）在这段幻想中，彼得表明自己不会再回归到家中“客厅”所象征的静止的、充满陈规的生活里，而是要生活在街头的动感当中，因为街道上的他能感觉到自己不断向前移动，超脱了眼下的困境。他重新肯定自我，让自我与超验的存在汇合在一起。

三、人与人群：街景、情感和共同体的形成

如前所述，波德莱尔笔下的闲逛者认为人群和孤独不可分离：“人群，孤独：对于一个活跃和多产的诗人来说，这两个词是相同的，可以替换。”^③ 类似地，

① See David Dowling, *Mrs. Dalloway: Mapping Streams of Consciousness*, p. 117.

② See Susan Merrill Squier, *Virginia Woolf and London: The Sexual Politics of the City*, p. 104.

③ Charles Baudelaire, *The Parisian Prowler: Le spleen de Paris, petits poèmes en prose*, p. 21.

对于威廉斯来说，城市中的个体难以意识到与他人共享着的人性，无法克服自身的孤寂和破碎感去建立共同体。然而，在《达》所描写的战争结束五年后的伦敦城市生活中，随着灰暗的社会氛围逐渐消退，社会性网络也逐渐恢复：小说中的个体几乎不约而同地都在街道上被热烈的气氛所感染，不仅在移动中感受到个人的自由，也感到自己参与到了公共空间当中，街道上的各种声响、行驶的汽车、兴高采烈的路人、摆弄着橱窗中商品的商店老板，都在与个体进行着某种互动，让个体与他人以及周遭环境建立起了联系。这种公共联系得以构建的关键在于人们都处于“街景”（streetscape）之中。^① 本文的“街景”既是包括声音、画面乃至温度在内的各种外在刺激的综合，也是由各种移动性所构建的动态网络；它是所有在其中的人所存在的背景，是人们形成共同体的基础，人们受到它的影响，但也时刻参与着对它的建构。

《达》中的街景有着历史的纵深，它的空间性让它得以保存对过去的记忆，向在街头上移动着的人们展示“旗帜飘扬的宫殿；维多利亚女王的铜像”（*Dalloway*: 22）以及特拉法加广场等标志性建筑物，提醒人们他们共有的文化传统、身份与历史经历。与此同时，赋予街景活力的更多是直接的感官刺激：街道上的橱窗与商品、公园与河滨的景观、来往的汽车乃至涌动的人群，甚至街道上随时出现的意外事件，都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刺激。虽然视觉能够带来隔绝以及操纵和控制^②，但它也能帮助观看者与观看对象之间形成认同，所以小说街景中的视觉刺激在人物之间能够引起联结而非隔绝。声音也是街景的重要元素，它仿佛是可感的物质，在时间的行进中蔓延。^③ 小说突出表现了声音，既包括规律性的声音，如大本钟的钟声，也包括街道上的许多随机的声响，如车辆行驶的声音。

^① 研究者指出，作为词根的“-scape”，其词源含义为一种特定的视觉景观，但该词根近年来已得到了广泛应用，超出了它原本的意义（see Ruth I. Aldrich, “The Development of ‘-scape’”, in *American Speech*, 41.2 [1966], p. 156）。例如，“soundscape”（声景）一词，R. 默里·谢弗将其定义为“声音环境”，指“真实的环境，或抽象的建构，如音乐作品或磁带蒙太奇”（see R. Murray Schafer, *The Soundscape: Our Sonic Environment and the Tuning of the World*, Rochester: Destiny Books, 1994, p. 274）。

^② 例如，坡的短篇小说《人群中的人》全篇都在描写街道和街道上的人的观察，充满了各种有关视觉的词语，叙述者从最初的漫不经心的观察、猜测、定义，发展到之后选择一个特定的人并在其身上实现自己规训他人的欲望（详见爱伦·坡《人群中的人》，第151-160页）。

^③ See Melba Cuddy-Keane, “Modernist Soundscapes and the Intelligent Ear: An Approach to Narrative through Auditory Perception”, in James Phelan and Peter J. Rabinowitz, eds., *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 Malden: Blackwell, 2005, pp. 386-388. 梅尔巴·古迪-基恩认为，《达》中大本钟的钟声建立起了一个“听觉共同体”，共同的听觉体验使身处不同地点的人都被纳入了这个共同体；但本文认为街景才是人群共同情感的来源，是这种共同情感塑造了共同体，而声音只是街景的一个元素。

音、救护车的警笛、赛马奔驰的声音以及板球拍击球的声音，这些总能让小说人物意识到并为之互动的声音造就了街道上的独特氛围，使克拉丽莎觉得自己“是这一切的一部分”（*Dalloway*: 7）。此外，街景还包括温度或天气带来的感官刺激，相较于室内的人，街道上的人更能敏锐地感知到温度或天气。小说中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极为炎热的夏日，这股热浪造就了一种“沉浸式的环境”，将街上的每个人都卷入其中。^① 最后，街景还是各种移动性构成的网络，其中既有人体本身的物理移动，也有交通工具的移动，正是这些移动性的交织促成了城市的动感，让小说中的人物感到自己也是这个动态网络的一部分，“与他人遭遇、碰撞或擦身而过”^②。于是，声音、画面、天气和移动性的网络共同构成了变化中的街景：“轻快的脚步、沉重的步履、疲惫的步态、吼叫和轰鸣；马车、汽车、公交车、卡车；胸前身后挂着两块广告牌的男人，时而脚步迟缓、时而大摇大摆；铜管乐队、手摇风琴；从头顶飞过的飞机发出奇异的尖啸声，铃声叮当，一片欢腾的气氛；这一切便是她[克拉丽莎]所喜爱的。”（*Dalloway*: 6）这一街景以其独特的氛围引发了相应的情感，构成了共同体的基础：共同体的构建不是因为人们偶然聚集在同一空间，而是因为外在事物会唤起相同的情感，让人们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从根本上是相通的、一致的，有着共同的经验，也有着相同的感受力与道德观，由此形成与他人之间的认同。^③

《达》中移动的人群所感受到的氛围及其引发的情感，就是这样一个共同体形成的典型例子。^④ 移动着的人具身性地参与到周围的环境中，因此对氛围有着更敏锐的感受：街头移动的人群处于持续的构成与解体之中，不断经历着街道上的突发事件，这些事件使得他们不断形成一个接一个的情感共同体，让他们成为这种现代都市中的情感聚合体的典型形象。^⑤ 在下面这个片段中，伍尔夫讨

① See Anna Jones Abramson, *The Age of Atmosphere: Air, Affect, and Technology in Modernist Literature*, PhD Dissert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16, p. 3.

② Michel Maffesoli, *The Time of the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 trans. Don Smith, London: Sage, 1996, p. 73.

③ See Michel Maffesoli, *The Time of the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 pp. 1-18.

④ 科斯蒂·马丁同样用氛围来解释《达》中的情感联系，他认为伍尔夫受到印象派和其他艺术风格的影响，将个体情感与氛围这个概念联系起来（see Kirsty Martin, *Modernism and the Rhythms of Sympathy: Vernon Lee, Virginia Woolf, and D. H. Lawr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 104-108）。虽然马丁提到了城市节奏对氛围建构的意义，但他没有从移动性的角度进行分析。

⑤ See Michel Maffesoli, *The Time of the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 p. 76.

论了街道上的人群与街景、情感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①：

砰！街道上传来一声枪响……那剧烈的爆炸声……来自一辆汽车……汽车离开了，但它留下一阵轻微的余波，蔓延到邦德街两旁的手套、帽子和成衣店。在三十秒的时间里，所有人的脑袋都朝着同一方向——窗外。女士们停下对手套的挑选……话音刚落，一些事情发生了。这些事情单独发生的时候太过琐碎，最精密的仪器……也无法记录下它们产生的震动。然而当它们聚合到一起时，却能产生惊人的力量，引发人们的普遍关注，唤起人们的情感。所有帽子和成衣店里的陌生人彼此注视，想到了死亡、旗帜和帝国。后街的一家酒馆里，一位来自殖民地的移民对温莎王朝出言不逊，这引发了争吵和喧闹，人们还摔碎了酒瓶。这些声音穿越街道，在女孩们耳朵里引起回响，当时她们正在为自己的婚礼挑选配有纯白丝带的内衣。汽车引发的表面的骚动逐渐消失，但却同时擦亮了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Dalloway*: 16-21）

在这段引文中，汽车发出枪声般的响声，随后停在路边，引起人们的注意和猜测；汽车离开后，它留下的影响仍在街道上传播，在身处花店、成衣店、酒馆和街上的不同人群之间回荡，街上的氛围由此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样的氛围是一些极为琐碎的事情“聚合到一起”后产生的，它们难以逐一列举、测量和分析，但却对每个人都产生了影响。诚然，这段引文中的许多表述都颇为模糊，伍尔夫并没有解释“一些事情”或“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究竟指的是什么，但如果在具体历史语境中考量引文中的陌生人为何会“想到了死亡、旗帜和帝国”，就不难发现伍尔夫所暗示的是这些陌生人共同拥有的历史和文化：他们都生活在大英帝国中，说着同样的语言，哪怕是来自殖民地的移民亦是如此；他们都经历了身边人的死亡，了解了战争的残酷，在幸运地熬过艰难时刻后最终聚集到了伦敦的街道上。在这种氛围中，哪怕没有交流，人们也知道曾感受过同样的恐惧和悲伤的彼此此时感受到的是对战争结束、日常生活终于恢复的喜悦和感激。共同的情感使人们意识到他人的存在，因此“彼此注视”，相互交流和确认，形成了情感的共同体。就这样，伍尔夫呈现了街景如何在人群中引发他们各自分散的经验，这些分散的经验又如何指向了共同的情感，而共同的情感又如何催生出对共同体的认同。

^① 安娜·琼斯·亚伯拉姆森也以小说中的这一段为例来分析氛围与共同体的关系，但她的分析角度是创伤与“氛围性的震惊”，关注的是心理学和美学的维度（see Anna Jones Abramson, *The Age of Atmosphere: Air, Affect, and Technology in Modernist Literature*, pp. 89-94）。本文是从更为物理性的层面对氛围进行分析，强调氛围和情感产生于人们所处的街景。

四、重建战后的个体与共同体

通过描写街道上移动的个人和共同体，《达》不仅为都市中的闲逛者形象增加了一个样本，也敦促经历了一战的毁灭和破坏后的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在维持自身个体性的同时在国家或民族这个集体之外与他人建立真正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集体身份既是战争爆发的诱因之一^①，也是战争的结果，在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中，个人没有选择地以国家身份被定义和划分，在有关国家存亡的宏大叙事面前，个体的反思与抉择显得微不足道，他们被不可避免地卷入一个被给定的集体的洪流当中。因此，在战后进行纪念与哀悼的同时，人们也有必要重新思考个体的存在何以可能以及共同体应如何在积极的意义上被建构。克拉丽莎因自己作为达洛维夫人这个身份而焦虑，感到逃离的冲动，这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对束缚自我的外在秩序的反思，也是个体在战后试图从集体身份中脱离出来的尝试。

如果个体丧失独立性，仅仅成为群体的一部分，极端的群体性暴力就有可能膨胀。在《群体心理》(1920)中，与伍尔夫同时代的英国心理学家威廉·麦克道格认为，一个群体有其“集体性的灵魂”，它“并不是组成群体的每个个体的精神生命的总和”，而是独立于个体，并能影响其中的个体。如果群体情感变得暴力和疯狂，那么作为其中一员的个体也容易丧失一定的责任感和自我意识，更少顾及他人，也更能接受残忍的场景。^② 麦克道格对群体的分析揭示了它向极端暴力演变的可能性；同样的，经历过战争的伍尔夫也深知群体暴力何以能够剥夺个人的自由与声音，造成灾难性后果^③。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对个人主体性的强调也就成为一种拒绝群体对个体的威胁、拒绝群体性疯狂的方式。事实上，在反思一战的同时，《达》也在与欧洲面临的新一轮威胁进行对话：1922年10月，贝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崛起；同月，伍尔夫开始写作《达》。如果说“统一和盲从”是法西斯主义依靠集体对个体进行控制的有力工具，那么小说中的自由

^① See Christine Froula, *Virginia Woolf and the Bloomsbury Avant-Garde: War, Civilization, Modern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66.

^② See William McDougall, *The Group Mind: A Sketch of the Principles of Collective Psychology with Some Attempt to Apply Them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National Life and Charact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7, pp. 7-9, pp. 39-40.

^③ 战争几乎是伍尔夫所有作品的语境和她所对话的对象，她的写作或可被理解为对战争和与之相关的意识形态的持续反思；就此而言，伍尔夫小说的一个共同主题便是在战争威胁下的日常生活应该如何延续（see Liesl Olson, *Modernism and the Ordi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8）。

流动以及打破边界的、弥散的、去中心化的自我状态便是法西斯主义赖以存在的服从和疯狂的对立面。^①

即便这个集体不具有直接的侵略性，它也可能出现对暴力或权力的崇拜，间接促发冲突。在《雅各的房间》中，伍尔夫已对此进行了反思：她思考希腊神话或古典传统所造就的英雄叙事，认为它让男性投入战场，也让女性支持个体的牺牲，并最终将所有人卷入一场无意义的战争。^② 就此而言，创作《达》时的作家已经超越了解构集体和战争神话这个阶段，开始了建构过程。思考战争之后的个体应如何继续生活、如何建立或重塑自我便是这个建构过程的一个部分，而在街道上的行走则是这种思考的结果：当每个个体都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移动轨迹，这已然是拒绝盲从和建立主体性。这个建构过程的另一部分是小说关于个体之间应如何联结从而拒绝集体对个体的压制的思考。在这个层面上，小说呈现的是一种公共生活的存在与个体在其中所共享的一切，这种共享正是共同体得以形成与延续的基础^③。这里的共同体并非由国家、民族、性别或阶级身份所建构，而是基于共同的创伤、记忆和情感乃至共通的人性。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达》对战争的纪念不仅是内在的、私人化的，更是在公共层面上共享的^④：“这个世界最近所经历的事情使所有男男女女眼中饱含泪水。它带来眼泪与悲痛；勇气与坚韧；坚毅与正直。”（*Dalloway*: 12）换言之，创伤与哀悼不仅是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更是在战后重建公共联结的纽带，它们帮助形成一个“经验性而非意识形态的”共同体。由此，伍尔夫“不仅在‘群众’和国家之外提供了一种另类的共同体，还重新创造了主体与主体之间[交流]的过程”。^⑤

小说在不同的情景中突出了这样一个另类的共同体的存在。例如，克拉丽莎感到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联系：“在事物的起起伏伏当中，她活下来了，彼得也活下来了，生活在彼此当中……她也确信自己是那些从未谋面的人的一部分。”（*Dalloway*: 11-12）联结克拉丽莎、彼得和其他陌生人的，是他们在经历了战争

^① See Lisa Low, "'Thou Canst Not Touch the Freedom of My Mind': Fascism and Disruptive Female Consciousness in *Mrs. Dalloway*", in Merry M. Pawlowski, ed., *Virginia Woolf and Fascism: Resisting the Dictators' Seduc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pp. 92-101.

^② See Christine Froula, *Virginia Woolf and the Bloomsbury Avant-Garde: War, Civilization, Modernity*, p. 92.

^③ See Jean-Luc Nancy, *The Inoperative Community*, ed. Peter Connor, trans. Peter Connor, et a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1, p. xxxvii.

^④ See Christine Froula, *Virginia Woolf and the Bloomsbury Avant-Garde: War, Civilization, Modernity*, p. 92.

^⑤ See Melba Cuddy-Keane, "Virginia Woolf and Cohabiting Communities", in Caroline Pollentier and Sarah Wilson, eds., *Modernist Communities across Cultures and Media*,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9, pp. 89-90.

中的轰炸和身边人的死亡后都“活下来了”这个事实，即便不曾相识，他们也能确定彼此都有着劫后余生的体验。相较于其他外在身份，这种共同的经历和体验更有力地人们聚集在一起。小说高潮处的聚会可谓这种聚集的具象化再现，聚会中的人们真正感受到了自我与周围的存在之间已建立起的联结^①，这尤其体现在小说的结尾：

“我会来的”，彼得说道，但他仍然坐着，待了一会儿。这种恐惧是什么？这种狂喜是什么？他思忖道。是什么使我异常激动？

是克拉丽莎，他说道。

她就在眼前。（*Dalloway*: 215）

克拉丽莎在聚会上得知了塞普蒂莫斯自杀的消息，感到“她必须回到他们当中……她必须回去。她必须把人们召集起来。她必须找到萨莉和彼得”（*Dalloway*: 206）。“战争[间接地]导致了[塞普蒂莫斯的]死亡，使每个人都直面死亡的问题”^②，他的自杀再次唤起了聚会参与者的战争创伤与他们共有的公共情感与记忆，让克拉丽莎产生了责任感：此时，她“必须”行动的原因不在于她是达洛维夫人，是宴会的举办者，而是她感到自己有必要将人们聚集在一起，构建一个共同体，强化彼此之间的联结，以此对抗死亡和造成死亡的战争。于是，“就在眼前”的克拉丽莎也让彼得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孤立的个体，他维持住了自我，而这个自我正是与他人建立联结的基础；换言之，在彼得这段短暂的从恐惧到狂喜的心理经历中，他终于意识到他与克拉丽莎之间形成了真正的联结，这种与他人的联结感战胜了自我的孤独感，让彼得“异常激动”。小说以这一场景结尾，强调了这种联结的重要意义，表达了对一个建立在共同的创伤、记忆和情感乃至共通的人性之上的“另类共同体”的信心。

在意识到新的战争威胁始终存在时，雅斯贝斯在一战后强调个体在保持自身个体性的同时在彼此间建立与强化联结的重要性：“真正的高贵不是在一种孤立的存在中找到的。它存在于独立的人的相互联结之中。这样的人意识到他们有责

^① 例如，小说两次描写了克拉丽莎望向一位老妇人时的反应，从第一次时的冷漠旁观到第二次时的意识到老妇人的主体性，这就是一个自我与他人之间建立起了公共性联系的例子（see Jessica Schiff Berman, “Ethical Folds: Ethics, Aesthetics, Woolf”, in *Modern Fiction Studies*, 50.1 [2004], pp. 168-169）。

^② Jessica Schiff Berman, “Ethical Folds: Ethics, Aesthetics, Woolf”, p. 169.

任发现彼此。”^① 雅斯贝斯的观点与伍尔夫在《达》中的思考结果不谋而合。事实上，共同体这个主题在伍尔夫的第一部小说中就有所体现^②。如果说《远航》中的共同体源自伍尔夫关于个体之间存在着交流与联结这个可能性的直觉，那么《达》中的“另类共同体”则有着更沉重的历史意义。尽管没有直接的说明，但《达》中反复出现的有关战争的指涉表明，小说在不断地回应战争，小说对一种“另类共同体”的探索也就在一定意义上成了作家关于在充满危机的世界中个体应如何存在这个问题的思考。在此后的创作中，伍尔夫继续进行着这样的思考，一直延续至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完成的最后一部小说《幕间》。在这部小说中，“团结”和“离散”这两个词反复出现^③，表达了作家对共同体或许会因战争再次来临而再次破碎这种可能性的焦虑。这表明，伍尔夫始终都认识到，对个体而言，无论是自身的主体性，还是自身与外在世界的联结，都不可或缺，正如列维纳斯所言：“主体并不是个自为者……主体是最一开始就为他者的……我的存在就是为他负责。”^④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伍尔夫借助小说创作承认并强调个体需要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责任，但正如《达》中那位“来自殖民地的移民”因为“对温莎王朝出言不逊”而“引发了争吵和喧闹”这一细节所表明的那样，这种承认实则仅限于认同帝国统治的臣民之间，作家本人并未能完全脱离与英帝国的共谋关系^⑤。这或可解释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来临后，伍尔夫一方面在最后一部小说中担心自己所憧憬的“另类共同体”面临解体，另一方面又前所未有地认同国家与民族，发现强硬主战的“丘吉尔让我感到振作了起来”^⑥，而这样的矛盾心理也就相应地让伍尔夫的“另类共同体”永远停留在了文学建构层面。

[作者简介] 杨家禹，女，1996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领域为现代主义文学。

责任编辑：龚 蓉

① 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18页。

② See Melba Cuddy-Keanne, “Virginia Woolf and Cohabiting Communities”, p. 98.

③ See Virginia Woolf, *Between the Acts*, London: Hogarth Press, 1947, pp. 229–235.

④ 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伦理与无限：与菲利普·尼莫的对话》，王士盛译，王恒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57页。列维纳斯指出，主体一词本就包含向他人臣服的含义（详见伊曼努尔·列维纳斯《另外于是，或，在超过是其是之处》，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02页）。

⑤ 详见蒋亮《弗·伍尔夫小说中的民族身份认同主题研究》，博士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3年，第238页。

⑥ Virginia Woolf, *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 6: *Leave the Letters Till We're Dead (1936–41)*, ed. Nigel Nicolson, London: Hogarth Press, 1980, p. 431.